

苏轼在《周礼》基础上提出重要观点：
为官六事 “廉而为首”

■ 管仲乐

【编者按】

近期，儋州市东坡书院“劝廉园”正式开园，园区主要通过“家风世传”“清风正气”“追慕苏词”“居琼雅趣”“千古一人”五大板块，展示廉吏苏东坡传奇且廉洁的一生。而借由深入梳理更多有关苏轼廉史的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其廉政思想由来有自，具备哲学基础，且有超越前人之处，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苏轼画像。资料图

澹泊财物，
使小偷空手而归

苏轼的清廉品质可溯源至其日常生活中的节俭朴素。他于黄州的《节饮食说》，顾名思义为节制饮食之意，文中阐述了他的饮食理念，“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日安分以养财，二日宽胃以养气，三日省费以养心。”可见，苏东坡虽然热爱美食，却反对毫无节制的饕餮。在他看来，每天饮食不超过一杯酒、一个荤菜即可，哪怕贵客来访亦不超过三个荤菜。若苏轼受到邀请，也预先告知对方标准，如逾越标准便不赴邀，并总结好处有三：一是心安理得，增长福分；二是宽解胃腑，培植元气；三是节省费用，积累财富。苏轼一生多舛，见惯黎民疾苦，这都促使他形成了勤俭节约的性格。曾随《高斋漫录》曾载：“东坡尝谓钱穆父曰：寻常往来，心知称家有无；草草相聚，不必过为具。”可见其对于口腹之欲的节制。

在工作中，苏轼延续了节俭之风。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知州，适逢密州遭遇灾荒，连年歉收。引发黎民居无定所，最终大量民众无奈沦为草寇。苏轼的《超然台记》记载此种局面：“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他面对此种案件频发，社会混乱的局面，一方面大力赈灾。缉拿盗贼，一方面以身作则挖野菜充饥，并作《后杞菊赋并叙》记录其挖食野菜的经历：“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厨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

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扞腹而笑。”行文乐观畅达，并发出了“人生一世，如屈伸时。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粃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的超然之慨。

苏轼不重外物，经常赈济他人，导致自己家徒四壁，《东坡志林·梁上君子》曾记载其宅“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由于苏轼对于财物的澹泊，导致梁上君子空手而归，也可称之为美谈。

读史感触，
少年立志当廉吏

苏轼从小就以身为榜样，《宋史·苏轼列传》记载，苏轼十余岁时读《后汉书·范滂传》，读到感触而跪请其母曰：“儿愿为滂，母亲许我乎？”母大喜答之：“汝能为滂，吾不能为滂母乎？”为官后，苏轼无论居于要位还是偏居一隅，也始终牢记“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的家训，恪守清廉的准则。

苏轼曾作《六事廉为本赋》专门论述为官者廉洁从政的重要性。文曰：“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六事”源自《周礼·天官宰宰第一·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是周代考评官员的六方面标准，亦即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法、明察。

苏轼在《周礼》基础上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一是“以廉而为首”。苏轼认为，在“六事”中，保持清正廉洁

是第一位的，这无疑是为官从政者必须时刻牢记的，是十分正确的；二是“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这就是说，在为官从政的过程中，要把廉洁自律贯彻到整个从政的过程，一以贯之，而不要半途而废；三是“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观点。苏轼总结了历代从政的经验教训，述清了保持廉洁为官的重要性。

因此，苏轼名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也可进一步理解为“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的“读买浙灯”“扬州罢会”“课百官”等疏章都反映了苏轼以民为本的思想。

廉政哲学，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苏轼于《范增论》一文提出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观点。文中苏轼针对陈平用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之事，提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也就是说东西总是自身先腐烂，然后虫子才会寄生，说明事物总是自己先有弱点，然后才为外物所侵。

苏轼为官，始终秉持正义、“循理无私”。《苏氏易传·坤卦》中云：“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又在《上曾丞相书》中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苏轼认为摒除私欲才是“通万物”的最终之理，这也是苏轼廉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南宋魏了翁称苏轼主持科举考试期间，“不惟遗其门人，虽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遗。”《宋史·文苑传·李廌传》载：“李廌六岁而孤，能自自立，少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颇受苏轼赏识，苏轼

曾写信给友人，介绍李廌说：“近有李廌者，阳翟人，虽狂气未除，而笔势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势。”李廌科举考场发挥不佳落第，令苏轼“无不骇叹”，甚是怅然。但苏轼并未利用手中权力，而是特地写《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余虽落第而李不得第愧》诗予以安慰鼓励，李廌最终成为苏门学士中唯一的布衣。

苏轼的秉公与严苛有着本质区别。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科举，考试临近之时突降大雪，延缓学子进京行程。苏轼上朝廷《大雪乞省事展限兼乞御试不分初覆考札子》书：“臣窃见近者大雪方数千里，道路坚塞，四方举人，赴省试者，三分中有二分到阙，朝廷虽展限，迫于三月放榜，所展日数不多。至时若隔下三五百人赴试不及，即恐寒寒举人，转见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最终，朝廷接纳了苏轼的建议，使众多举子得以顺利参加考试。

苏轼虽生活在皇权为本的封建时代，却有着尤为真诚的政治理想。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曾提出：“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他希望这个世界存在一种永恒的道德秩序，百姓安宁、官员清廉、社会和谐，反之则“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也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当他在人生的尽头，挥笔写下“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时，他已经把自己的功绩与黎民百姓的福祉结合在一起，早已忘记了在京城时的富贵荣华，只愿留下一个乐观豁达、清明磊落的身影，即使笠履着身，斜风细雨，依旧“负大瓢行歌于田间”，自得其乐，不改其志，这也是“东坡精神”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文献学博士、副教授】

明代儋州举人唐维
“从今频往返，
归路不辞遥”

■ 陈有济

儋州市洋浦新英湾区太平社区唐屋村有一座海南现存形制最全的科举功名坊——发祥坊，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坊主是明代儋州举人唐维。

唐维，号松山，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出生，父亲唐朝胤是地方上有名的读书人，唐维为唐朝胤的第三子，天资出众，素敦孝敬，自幼勤于学问，酷爱古文。唐维考取生员后，在诸生中出类拔萃，受到时任儋州知州萧弘鲁的器重，两人关系良好，成为忘年之交。

嘉靖十六年（1537年），岁次丁酉，是一个大比之年。这一年，唐维由琼州府学考中了广东乡试举人，那一科，海南共有4人登举人榜。

科举时代，官府为了表彰士子获得功名，同时鼓励百姓勤奋学习，以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往往会给考中举人、进士的学子树立科举牌坊。嘉靖十八年（1539年），当时的儋州官方在洋浦唐屋村为唐维立了一座发祥坊，这对唐维、唐氏家族乃至当地来说，都是一大殊荣。



位于儋州市新英湾区太平社区唐屋村的发祥坊。唐浩义 摄

发祥坊位于唐屋村祭祀祖先的演清堂的前方，为三面四柱结构，硬山式屋顶，材质是玄武岩，中间坊额横书“发祥”两个正楷大字。唐维中举，成为唐屋村的第一位举人，族人在官府建立发祥坊之后，也修了一座五层石塔来庆祝和纪念这一光宗耀祖的大事。塔因位于演清堂前而被称为演清塔，也有人管它叫文笔塔或莲花塔，该塔基座为莲花座，塔刹呈莲花状。据传，唐维的族人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修建演清塔的，祈盼演清塔也能调节唐屋村的风水，使“地脉兴”而“人文焕”，让唐氏出现更多的人才，与“发祥”的寓意契合。

发祥坊与演清塔至今仍屹立于唐屋村，发祥坊已成为海南尚存形制较为完整的古牌坊之一，二者寓意文运昌盛，一直在激励后辈学子奋发向上，可谓唐维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唐维出任扬州府通判，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擢升扬州府同知。关于唐维的政绩，万历《儋州志》语焉不详，只说他“廉能有声”。其实，唐维曾与抗倭名将胡宗宪、解明道等人一起，直接参与指挥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两次大规模的抗倭之战。

唐维卸任后回到儋州，在家乡悠游田园，以吟诗作赋为乐。史称唐维非常勤于创作，“诗文满壁”，《儋州志》中收录其赋一首《儋州屏壁赋》和诗歌一首《那细泉》：“地本居幽僻，天教慰寥寥。池无一亩广，泉有万珠跳。坐浴清心骨，行吟厌市朝。从今频往返，归路不辞遥。”此诗为唐维游历于州城北四十里的那细泉后所赋，从中可见唐维浓厚的田园情怀。

南宋时，儋州修成当地的第一部方志《南宁军志》，元代儋州没有重修志书，进入明朝后的一百多年间，儋州也未能修成一部州志。知州萧弘鲁深知志对儋州的重要性，于是请来了唐维负责此事。遗憾的是，唐维所修的州志最终没有成书传世。

凌阴、冰井台、冰鉴
古代的“冷库空调冰箱”

清代的柏木冰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土，与地面平行。窑门向下，有石阶，窑底面向一侧倾斜，最低处与一眼深井通联，以便融水排入。

秦汉时期，王宫殿宇、权贵豪宅出现了消暑的含凉殿、冷水亭，就是仿照农人车水浇田的方法，将水储到高处放流，催动水车链接扇叶转动，可以对着冰块吹，也可对着垂流吹，即时凉气涌动，暑热消散，清爽舒适。三国时期的曹操还发明了一种控暑降温的“冰井台”，即在室内挖深井，汲入冰块盖严，在井盖上凿孔，便有冷气外溢，是名副其实的“空调”。

骄阳似火的季节有了冰，让古人的脑洞大开，设计、制作出许多冷藏、保鲜用具和消暑、降温饮品。早在战国时期，出现了青铜冰鉴，即是带隔层的四足铜铸方箱，配有厚重、严密的箱盖，隔层放冰块，箱内装饮品或食物，纵是酷暑时节，也能享用到冰镇冷饮、凉爽美食。

屈原在《招魂》一诗中写道：“挫糟冻饮，耐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意思是



说，宴席摆好了，有许多冰镇的玉液琼浆，喝起来特别凉爽。

唐宋时，出现了“冰鉴”的升级版“柏木冰箱”，即用隔凉隔热的柏木制成三层木箱，上下层密封，放置冰块，中间层放食物。当时，人们发现硝石不但能制造火药，放入水中还会吸收热量，甚至结冰。有人就仿照“柏木冰箱”制成一种叫作“甌”的冷藏箱，在密封层填入硝石灌满水制冷，装入鲜货能保质六七天。唐代从岭南给长安的杨贵妃送荔枝，宋代从福建为身居汴梁的仁宗皇帝送鲜鱼，都是装在“甌”中运送的。

唐宋时期，民间也开始有了储冰的冷库。首先挖出五六米深的方窖，在窖底燃起猛火，直烧得四壁挺实坚硬，以防坍塌、渗水，然后架起椽、椽，铺一米多厚的芦苇

或稻草隔热，再用黄泥覆顶，建造材料和方法虽简陋，但保温效果并不逊色于官家的“凌阴”。

到了宋代，市面出现一种叫“冰酥”的冷饮，用碎冰、果汁、牛奶等调成，看上去凝固挺硬，吃起来却软绵绵，凉爽清甜，奶香浓郁。当时的知名文人杨万里写诗赞誉“冰酥”：“似酥还成爽，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销。”

元代，马可·波罗来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让厨厨制作“冰酥”款待这位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回国时带走了“冰酥”配方，后又传到伦敦，英国人进行了更新改造，才有了如今的“冰激凌”。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姚家岗宫殿遗址的商周时代“凌阴”遗迹。

图片来源：宝鸡市展览馆

■ 周文洋

唐代诗人王毂在《杂曲歌辞·苦热行》中写道：“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中。五岳翠乾云彩灭，阴侯海底愁波竭。何当一夕金风发，为我扫却天下热。”诗中描绘了一幅酷暑的画面：像火神祝融赶着火龙，把天地烧得通红，烈日悬在中天不肯离去，熔炉般烘烤着世间万物。

古代没有电风扇、空调，也没有冷柜、冰箱，古人靠什么消暑降温，度过炎炎盛夏？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古人已开始挖窖储冰，第二年夏季用来制冷消暑。当时，存放冰块的冷库称“凌阴”。《诗经·邶风》写道：“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天寒地冻时节去河里凿冰，储藏进冷库。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发现了商周时代的“凌阴”遗址，那是一座深挖5米多的地窖，四壁砌以青石，在3米多处垒出拱顶，上覆夯